

中西文化语境里的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李伟民 著



外教社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四川外语学院科研资助项目

中西文化语境里的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李伟民 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 / 李伟民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5446 - 1467 - 2

I. 中… II. 李… III. 莎士比亚, W. (1564~1616) – 戏剧文学 – 文学研究 IV. 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604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以文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29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 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467-2 / I · 0122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7

第一章 浪漫主义精神的激情宣泄

浪漫派莎评的勇敢旗手	26
现代性：自然自由激情的戏剧	38
施莱格尔兄弟对莎士比亚的解读	52
海涅的浪漫主义莎评	65
莱辛对莎士比亚戏剧审美价值的认识	81
雨果的浪漫主义莎评	96
戏剧行动与完美假象	115

第二章 基督教精神的隐喻

《哈姆莱特》中的基督教隐喻	130
对爱的真切呼唤：《李尔王》中的基督教倾向	156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基督教观念	171
《威尼斯商人》与莎士比亚的宗教观	190

第三章 后现代理论观照下的莎士比亚

在西方正典旗帜下：

哈罗德·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阐释	208
道德伦理层面的异化：在人与非人之间	222

从“嫉妒说”到“他者”的理论转向	235
福斯塔夫在消解英雄中所体现出来的喜剧精神	248
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双重空间	265

第四章 女性主义、人性与自然

《维纳斯与阿董尼》与女性主义视角	278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鲁克丽丝受辱记》	293

第五章 人性的阐释、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莎学

在社会与命运中毁灭的美与爱	308
否定战争与呼唤和平	321
马克思主义莎学的集大成者	337

第六章 莎士比亚在当下中国

对莎士比亚的开掘、守望与精神期待	356
台湾的莎学	370

附录

智者和愚人的对应与耦合	380
-------------------	-----

主要参考书目	387
---------------------	------------

后记	394
-----------------	------------

前言

种情况的。但是,莎士比亚作品又与其他经典有所不同。它的经典地位显示出一种长期的稳定性,不仅在世界范围的文学经典文本研究中独占鳌头,而且在舞台上常演不衰。

我们对经典阐释的最终意义在于发掘经典内在的精神价值与审美价值,不断放大经典的人文价值。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莎士比亚则是第二种可能性的绝佳榜样。”^①莎士比亚的经典地位就充分显示出了这样的陌生性。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获得在于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而莎士比亚作品具有连接通俗与经典的独特魅力。莎剧在产生之初由于其通俗性、娱乐性与时代和社会有紧密联系,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断激发人们对它自身、文学与艺术和人性产生新的认识,其通俗性的身份已经被改写。莎剧在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地被解构与重构,是莎士比亚赢得经典地位的重要原因。

下面,在兼及中国莎学发展史的基础上,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现状作出一番描述、展望,并提出若干研究策略。

一、成绩与困难

纵观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我们看到,尽管中国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显得比较沉寂,“危机”之说也时有耳闻,但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莎学研究论文仍然居于外国

^①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文学研究之首。不容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莎学研究始终得以持续并保持其研究势头不衰，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文本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演出、莎士比亚课堂教学。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戏剧理论、戏剧演出的不断发展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莎学研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莎学研究缺乏长远规划，没有形成重大的理论突破；研究方法老化，引进西方最新莎学研究成果不足，与西方莎学界缺乏长期、固定和经常性的交流；国内学者之间、研究与演出之间缺乏对话渠道；缺乏足以实现中国莎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具有深刻性世界影响的莎学论著，莎剧演出困难较多，研究经费匮乏等等。

但是，毋庸讳言，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繁荣，国外莎剧演出的引入，中国莎剧演出经过不断打磨后的日趋成熟，以及西方文学艺术理论所带来的某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中国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增强了，研究视野开扩了，中青年莎学学者逐渐成熟，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研究的方法也较以前更加多样化了。

二、莎剧演出激活中国莎学研究

莎士比亚研究区别于其他外国作家研究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不仅可以进行文本研究和考证，而且可以进行舞台创作实践。这是莎士比亚戏剧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莎士比亚戏剧不但可以用英语演出，而且可以移植成中国戏曲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不仅被专业戏剧团体推上舞台，而且，已经

成为大学生校园戏剧经常性演出的剧目,这是莎士比亚批评不断被激活的原动力之一,也是莎士比亚在中国被经典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莎剧演出,都构成了中国莎学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由莎剧改编的中国戏曲已经成为世界莎士比亚舞台上的奇葩。因为中国戏曲莎剧以不同于西方话剧的“唱念做打”,加上西方观众已经烂熟于心的莎剧故事情节,中国戏曲莎剧的演出往往会使他们产生眼前一亮的感觉。京剧、昆剧、川剧、越剧等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结合,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显现出了双重叠加的经典艺术价值。借中国戏曲移植莎剧,产生的艺术震撼力、冲击力是巨大的,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也不容忽视。^① 莎剧演出对于理解莎剧,从创作、导演、表演及实践和理论的角度探讨莎剧不仅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给西方观众送去了中国戏曲、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而且也通过演出,带动、促进了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

① 中国的莎剧演出是 20 世纪初叶从校园开始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校园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一直没有中断,近年来校园莎剧演出在许多学校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自 2005 年起,在香港已经连续举行了四届“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比赛”,而四川外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也已经连续举办了多次“莎士比亚艺术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的学生莎剧演出也很活跃。在“全国莎士比亚研究和英语文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四川外语学院奉献了《无事生非》、《罗密欧与朱丽叶》,四川大学提供了《一报还一报》,电子科技大学提供了《温莎的风流娘们》,这些演出均受到了莎学专家的肯定。在“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暨第二届重庆大学生戏剧节”上,四川外语学院的英文莎剧《哈姆雷特》被称为戏剧节的一个亮点。参见李伟民等:《中国莎士比亚学者的一次盛会——“莎士比亚研究与英语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大写意》,《四川戏剧》2007 年第 1 期,以及《英语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0 页。

从中国莎学的发展史来看,中国现代戏剧从萌芽期开始就受到莎剧艺术的滋养,显性影响表现为对莎作的阅读、翻译、研究、传播;深层影响表现为莎剧在人物塑造、情节丰富性、生动性、语言诗意化、现实主义表现、风格浪漫化和莎氏悲剧审美方式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莎剧和中国戏曲的结合相得益彰,从莎剧中我们更看到了中国戏曲巨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将莎剧搬上中国舞台不仅具有文化交流上的象征意义,是与经典对话,也是参与世界戏剧舞台艺术之间的对话,显示对世界优秀文学艺术的尊重,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尤其在已经远离了“救亡”与“革命”的年代,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对人性的呼唤,已经远远超过了包括易卜生戏剧在内的那些可以对社会生活直接进行干预的“社会问题剧”。这是莎剧得以受到中国众多剧种青睐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莎剧如何为当代观众接受并喜爱,一直是莎剧研究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中国戏曲莎剧的演出不仅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纽带,而且也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的一条途径,成为古老艺术形式与现代戏剧观念的对接方式之一。所以,很多采用中国戏曲形式改编的莎剧受到了中国观众和西方观众的喜爱,中国戏曲的传播与莎士比亚经典的回馈,取得的是双赢的成功。通过莎剧演出实践,人们认识到,既可以有传统形式的莎剧演出,也可以借莎剧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与观念,二者并不矛盾。莎剧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生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性的一座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 21 世纪的中国莎学领域,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将放射出更加璀璨耀眼的光芒。

三、借鉴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他山之石

为了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就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如果我们的莎士比亚研究仍然停留在以往研究范式的框架中,那么这样的研究就很难取得大的进展。由于学养、学识的差距,我们甚至不能超越我们的前辈莎学研究者。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随着西方学术界在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文论的引进,一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和后现代语境出发,对莎士比亚最重要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进行了深入解读,从语言、宗教、莎氏对西方作家影响角度对莎剧进行研究。因此,从这一角度对莎士比亚进行阐释,我们就会获得远比前辈莎学学者更丰富的阐释资源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这种多角度、多种理论参与的阐释,不仅使莎士比亚研究成为检验各种理论和学说的试金石,而且使中国莎学研究范围不断得以拓宽。尽管这种研究还相当的不成熟和稚嫩,但毕竟在阐释策略上建构起了理论的层面,在认识深度上有所加强,在研究形式上有所创新,甚至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示。研究者利用当下的西方文论建构与解构莎剧,能使人们对原有视点下的莎学研究形成某种超越,甚至可以对我们以往的莎士比亚批评进行检验、校正和再批评。

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本身就具有“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证’”^①的特点,不但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第 11 页。

文学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促进现代莎学的不断创新也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从当下的西方文学、文化理论出发阐释莎作在中国莎学研究中的比重在逐年增加。这类研究既有从宗教、心理学、浪漫主义的研究出发观照莎氏作品,又有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叙事文学、后结构主义、原型理论、文学符号学阐发莎氏作品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近年来国内对西方文论的引进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表明莎学研究者的某种学术自觉,即莎学研究者力求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围与范式,寻求莎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莎剧既具有人文主义文学反对封建桎梏,争取个性解放、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了仁慈、宽恕、博爱精神,这种精神既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和基督教思想,其中又异常鲜明地体现了“人文主义——基督教”双重文化价值意识,并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文学家的基本价值指向和莎士比亚剧作人文精神的主要价值取向。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研究中,我们获得了与原来的中国莎学研究迥异的观点和有很大差异的评价,进一步认识到莎士比亚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我们看到,不但莎氏悲剧与基督教有不容忽视的联系,而且莎士比亚的喜剧也是贯穿着《圣经》教义与宗教典故的作品。尽管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一再强调:“莎氏最压抑的悲剧《李尔王》和《麦克白》产生不出基督教意识,伟大而隐晦的戏剧《哈姆莱特》和《一报还一报》也不会。”^①但那毕竟只是哈罗德·布鲁姆的一家之言,我们

^①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我们没有基督教的生活背景，所以才会更加敏感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

现今的中国莎学研究已经超越以前的以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研究莎作的模式，已关注到从美学、现代性、文化等层面把握莎作的精神。如莎剧处理戏剧人物心理活动、暗示情节、简练剧情、拓展戏剧舞台空间等手法，使观众获得了相对自由和强烈时间差的感觉；“种族”、“性别”、“他者”等后殖民关键词彰显了莎剧的后殖民色彩，就内容产生的历史依据和体现的殖民主义象征意义、人物蕴涵的殖民话语中东方主义思维方式、被歪曲表征的被殖民者形象、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悲哀说明了殖民主义主题；莎剧中人性的善恶两面各有神魔对应的原型系列等话题；莎剧中蕴涵的情节是否是由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基督教神话融合而成的问题，以及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狂欢化色彩。纵观莎学研究，我们看到，既有从“绿色世界”的建构和语言戏谑，人文主义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狂欢精神”；也有以莎剧与《圣经·创世纪》的主要内容、整体结构有对应关系，隐含的《圣经》特有的叙事结构，贯穿了《圣经》中的惩罚与拯救思想的研究；还有通过女性主义研究与莎作，人们看到莎剧中的一些女主人公受到男性话语的压迫，但她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压迫，她们对男性话语的颠覆是当时社会的权力场所不能允许的，而且也受到了某种抑制，解构显示莎剧的主要倾向也不是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是以建立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旨等讨论。这些研究均从不同的侧面对莎士比亚进行了现代意义的阐释。

四、语言、翻译角度的批评

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上,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译介的同时也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批评。20世纪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语用学转向”。近年来莎氏语言、翻译研究也正在尝试这种转向,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研究和探讨某个词的涵义或某段话翻译得是否准确。莎士比亚语言研究专书的出版,代表了这一方面的成果。^① 研究者发现,莎氏在作品中显示了独特的语言创造能力和善于操纵及发展语汇意义的能力。莎氏作品拥有丰富的词汇、生动的比喻、一词多义形成的戏剧性俏皮滑稽的双关语、通俗语、俚语、行话和切口,这些语言和修辞手段往往在莎剧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对近代英语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中国莎学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莎氏语言中的这种现象,“在对西方文学翻译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是语言问题,中西文学共通的‘言文合一’也就成了一个经常讨论的核心问题”。这样的讨论既是莎士比亚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因此,莎学批评感兴趣的是莎氏语言与现代英语的关系,是莎氏语言的结构、语法、修辞、用词等语言特点。研究者从词汇、语法、修辞三个层面对莎氏语言的开拓性、可塑性和戏谑性切入,分析了其中的奇特句式、表义功能,认为莎剧中的双关语起到了烘托气氛、讽刺、幽默的效果,展示了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他们从讨论莎剧气氛的建立、人物刻画与修辞、主题的呈现、著名独白对比的诗歌形式繁复的散文风格,到注意语言与戏剧的结合,从语义学理论、词条分析莎剧的语言特色。

^① 这些专书的研究范围仍然主要是对于具体语言现象的评价,可参见徐鹏:《莎士比亚的修辞手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桂扬清:《莎翁作品译文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中国莎学研究中,翻译莎氏作品取得了辉煌成就。莎氏作品的翻译、教学、评论与演出,是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四个方面。刘炳善先生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可谓莎作翻译批评的集大成之作。^① 翻译批评注意从语言学转向出发,以解构主义、互文性、意合与形合、关联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从会话含义、语码转换、语言风格学、文本功能理论等方面开展了对莎氏作品的翻译批评。然而,这些翻译批评还难以形成气候,甚至有些还没有形成专文。我们可以看到,莎剧中的台词已经成为翻译批评向语言学转向中的重要语言材料和例证,研究虽然相对薄弱,尚没有形成一定气候,但说明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已在悄然变化。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在史料的钩沉方面,人们考察了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亮乐月 (Laura M. White, 1867~?) 翻译的《刺肉记》(《威尼斯商人》),这是国内首次报道这一译本的存在。通过对《刺肉记》的译文进行分析,探讨了亮乐月如何以特殊的女性传教士视角,采用相应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在译文中传达基督教思想和男女平等的西方思想和观念。^② 同时对邵挺翻译的《天仇记》(《哈姆莱特》)以及张常人翻译的《好事多磨》的译文进行了深入分析。一些研究还以莎学研究历史为经,以史料为纬,对一些著名莎学家如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孙家琇、卞之琳、杨周翰、王佐良、赵澧、李赋宁、张泗洋等的莎学研究思想以及“莎剧在文艺期刊上的各种摘译”进行了探讨和

^① 李伟民:《普及推广莎士比亚研究的基本建设——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辞书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87—93 页。

^② 朱静:《新发现的莎剧〈威尼斯商人〉中译本〈刺肉记〉》,《中国翻译》,2005 年第 4 期,第 50—54 页。

梳理。

尽管莎士比亚传入中国的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已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急需我们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和研究。^{①②} 与此同时,我们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发生、发展,成果、思想、批评轨迹也需要梳理,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五、阐释中的比较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成果的增多,表现为随着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和壮大,从比较的角度,采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解析莎作,以及从中西文明视角出发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更广泛的研究空间,也为中国莎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不同语言的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则能够有相对稳定的较高的比较价值”,因为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发现不同语言载体中的文学的独特的审美机制上,尤其是那种只为某种民族和语言的文学所独有的审美特点和审美机制”^③上,才是我们莎士比亚研究的目的。应该说,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作品比较研究是一个大题目,在这个题目之下,既可以有宏观的比较也可以有微观的比较;既可以是作家之间的比较,作品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是戏剧之间的比较,甚至是表演形式之间的比较。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由于其跨文化的性质,本身就成为了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据统计,与其他域外作家

^① 李伟民:《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② 王建开:《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上海翻译》2007年第2期,第58页。

^③ 奉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和中国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研究相比，“关于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成果最多”，其中既有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的平行研究，如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关汉卿、李渔、纪君祥、曹雪芹及其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也有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的研究。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经常涉及的课题之一。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莎学研究主要是在五个层面上展开的，即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古典戏剧的比较；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影响的比较；莎士比亚与外国作家、作品的比较；关于中国戏剧、戏曲改编莎剧的争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① 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莎氏研究来看，我们发现，在一般的比较文学论著中，对莎士比亚的比较主要借鉴了莎学研究者的成果，而在平行研究中，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的平行比较很难超越同异比附的僵硬模式。把莎剧中的人物放在世界文学史的范围内进行比较，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悲剧人物的共性与不同的个性，从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探索人性，诸如此类的比较尽管还存在着若干不足，但有助于人们从中西方文学、戏剧的审美角度把握莎氏戏剧的美学与道德意义，从不同方面的比较介入，能够更深刻地领悟到中西文学艺术、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从中西戏剧比较出发，结合莎剧和中国戏剧、戏曲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从更加广泛的层面认识文化的包容性与兼容性，能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互相借鉴，并最终在这种

^① 李伟民：《比较文学视野观照下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70—174页。